

唐代思想史嬗变与情欲叙事的文学生成

——以唐传奇为中心的跨学科考察

何蕾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 安徽蚌埠, 233030)

摘要: 内容涉及婚恋的唐传奇作品, 难免会描写艳情场面, 有的一笔带过, 有的含蓄委婉, 有的则简单粗暴。为人所熟知的经典爱情传奇《霍小玉传》《莺莺传》等, 艳情场面的描写文辞清丽、婉转含蓄, 另一类作品如情色意味颇浓的《游仙窟》, 语言华丽、充满挑逗, 而饱受诟病的《河间传》则以直白、露骨著称。站在儒家礼教的立场, 无论是风流奇异的《游仙窟》、粗俗露骨的《河间传》, 还是颂赞爱情的《霍小玉传》等作品, 俱属“淫奔”之作, 在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述上都呈现出突破礼法秩序的倾向。结合唐代思想史进程来看, 知识阶层在房中术与医学和道教融合、密宗东传等因素的影响下, 对男女两性结合的观念突破了儒家礼教的束缚, 回归饮食男女的人性本质。因此, 在述及男女婚恋的传奇作品中, 无须刻意回避艳情场面的书写, 而是采用风格各异的艺术手法进行表达, 向后人展示出鲜活生动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

关键词: 唐传奇; 艳情书写; 道教; 密宗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6-0185-09

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作品, 多少会涉及艳情场面描写。不同作品的艳情书写风格各异, 总体而言, “绰有情致”的经典爱情传奇作品如《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偏雅致、浪漫^[1], 情色倾向明显的作品如《游仙窟》《河间传》等则倾向于直露、浅俗。作为较早的成熟小说体式, 唐传奇的创作和发展除受到文学自身规律的作用之外, 思想史进程的特点是否对其有所投射, 进而对其风格和特征产生影响, 目前学界对此还未予以特别关注。本文试从唐代思想史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重点就房中术与医学和道教融合的趋向、外来宗教观念对士人阶层的影响等方面, 探寻唐传奇艳情书写与唐代思想史背景之间的联系。

一、雅俗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唐传奇情欲书写的叙事范式与美学张力

经典爱情传奇语言清丽雅致, 艳情场面书写婉约含蓄。《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作品, 人物设定以才子佳人模式为主, 偏重描绘两性之间的情感发展过程, 尤善叙述女性情感历程和心理, 对于情欲场面的书写含蓄委婉, 偏向雅致一路, 可谓“温柔敦厚”。《霍小玉传》描写霍小玉出场时, 以李益的反应侧面烘托霍小玉的惊人美貌, 曰: “遂命酒饌, 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 若琼林玉树, 互相照曜, 转盼精彩射人。”^{[2](78)}对于霍小玉与李益的初夜, 但云: “解罗衣之际, 态有余妍, 低帏昵枕, 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2](78)}这一场景的描述简洁

收稿日期: 2025-03-07; 修回日期: 2025-06-09

作者简介: 何蕾, 女, 安徽蚌埠人, 文学博士,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古典诗学, 联系邮箱: 13909628195@163.com

含蓄,虽叙艳情而含蓄温婉,以第三人视角描述双方的感受,强调如鱼得水的情感结合,与后文李益抛弃霍小玉的冷酷描写形成鲜明对比。《李娃传》的主角设定虽与《霍小玉传》相似,叙写娼妓与世家子弟的爱情悲欢,但情节更为曲折、风格更为浪漫。故事中郑生与李娃的初遇十分动人:

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2](100)}

对于郑生与李娃的枕席之欢,只通过鸨母之口含蓄点出:“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2](101)}《李娃传》通篇只有这一处涉及“男女大欲”描写,而《霍小玉传》也仅叙写了霍、李初次结合的场景,余则再无情欲场景描述。与《李娃传》《霍小玉传》相比,《莺莺传》于艳情场面描绘更多,文词清丽、细节丰富。云: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2](136-137)}

这段描写极为生动艳冶,细节处体现了青年男女的炽热欲望却不嫌粗鄙,尤其“斜月晶莹,幽辉半床”一句意境邈远,以诗情盖覆艳情,使得整个艳情场面毫无色欲之感,反倒给人以美好遐想,似不违传统诗教“温柔敦厚”之旨。不过《莺莺传》结尾附元稹《会真诗》,以诗歌的语言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男女两性结合的场景,堪称唐代艳情诗经典,突出《莺莺传》整篇故事的艳情意味。晚唐传奇《非烟传》描绘步非烟与出轨对象赵象的艳情场面也较为含蓄,云“交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房中,遂背缸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2](294)}。这段描写与《莺莺传》中张生与崔氏相会的场面描写颇为相似,尤其“晓钟初动”的场景描述,含蓄指出两人共度良宵的事实。总而言之,现存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作品中,对于艳情场面的描述倾向于含蓄婉约,作者大多注重氛围、意境的营造。还有一类作品,融婚恋与求仙为一体,如《裴航》。故事先叙述读书人裴航邂逅佳人、追求佳人的过程,于佳人容貌气质的描绘方面较为着意,文辞简洁、情节曲折,最后叙述两人如愿结合的时候,仅只一句:“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迄。”^{[2](274)}故事至此,婚恋与求仙合二为一,以“仙童侍女”指代神仙家,以“入帐就礼”指代两性结合,有儒道合一的意味。不过道教本就反对禁欲,主张“对现世的生存自由与对永恒的生命存在的热烈追求”^[3],认为男女两情相悦、两性结合也是长生的一种途径。此类作品在现存婚恋题材唐传奇中数量较少,此不赘言。

另一类涉及男女两性情爱的作品,则偏重情色描写,如《游仙窟》《河间传》等作品,前者语言华丽、后者直白浅俗。

《游仙窟》以奇异的情节设定和骈散相间、唱白夹杂的语言形式,塑造了男主人公放纵不羁的才子形象,艳情书写华丽而放荡,被视为唐代经典艳情小说。而《河间传》则因粗俗的情欲描写饱受争议,被视为唐传奇作品中的异类。《游仙窟》对艳情场面的细致描绘和大胆书写,颇具纵欲倾向:

于时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鱼灯四面照,蜡烛两边明。十娘即唤桂心,并呼芍药,与少府脱靴履,叠袍衣,阁幞头,挂腰带。然后自与十娘施绫帔,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花容满目,香风裂鼻。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褥,交脚翠被。两唇对口,一臂枕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吃一意快,一勒一伤心,鼻里痠痹,心中结縈;少时眼花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谁知可憎病鹊,夜半惊人;薄媚狂鸡,三更唱晓。遂则披衣对坐,泣泪相看。^{[2](31)}

这段情欲描写重在色欲表达,已背离传统“艳情”概念范畴,堪称唐代小说情色书写巅峰。不过早前的学术界并未就此作出评断。鲁迅曾评价《游仙窟》“可资博识”^[4],并没有就其中的艳情描写

作出评价，有当代学者认为《游仙窟》的价值在于“男女欢爱的题材进入传奇，给刻板僵化的志怪小说注入了一支青春的活力剂”^[5]。而《游仙窟》的作者张鷟却因为喜爱创作艳情诗文而被讥为“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6]。与华丽艳冶的《游仙窟》相比，柳宗元的《河间传》语言简洁，主旨明了，充分体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陈言务去、文从字顺的表达特点。但《河间传》历来颇多争议，其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是涉及性场面的描写粗鄙露骨，在流传至今的唐传奇作品中当属异类，与柳宗元一代宗师的身份殊为不符。《河间传》从人物设定上来看，尚可算婚恋故事，但无明显感情线，主要叙述女主河间由贞到淫的心理行为变化，对其丈夫的刻画较少，亦少心理描写。因对女主河间淫行的描绘较为露骨，《河间传》一直被斥为“秽杂”“鄙褻”，如叙述河间设计害死丈夫后的所作所为可谓惊世骇俗，云：

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保逐为荒淫。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嫌。又为酒垆西南隅，已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7](1343)}

这段描述言简意赅，人物形象鲜明，所述河间之行即便发生在现代社会，也属违背公序良俗的背德之行。《游仙窟》以华丽的语言刻写无行士子与娼妓的露水情缘，《河间传》以散文笔法叙写一个上流社会女性的淫行。于两性场面描绘而言，各具特色，一以词艳著称，一以露骨获诋。托名牛僧孺的《周秦行纪》撇去政治阴谋不谈，以艳词和诗歌构拟了一个迷人的艳情世界，但是男女结合的局面也只一笔带过，“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最后以“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2](153)}，暗示了男主对艳遇的回味。

站在儒家礼教的立场来看，无论是风流奇异的《游仙窟》、粗俗露骨的《河间传》，还是颂赞爱情的《霍小玉传》等作品，俱属“淫奔”之作。可以说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作品在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述上都呈现出突破礼法秩序的倾向。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涉及艳情描写的传奇作品，创作年代跨越近两百年。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传统房中术的社会接受程度、儒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变化、外来宗教对知识阶层的影响等思想史进程的方方面面，与小说作者描写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当有关联。

二、房中术的医学化转向与道教义理融合——唐代性文化的思想史重构

房中术的传播，是唐代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描写两性关系不那么束手束脚的原因之一。房中术在唐代丧失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却因可致“寿考”的特点而被纳入医学领域，以治病、养生的核心功能成为医学之一部，也因与道教的长生追求不谋而合，成为道教养生术之一种。在三教并行的社会环境下，士大夫无论对于儒学多么忠诚，如力排佛老的韩愈，因为寻求“寿考”的原因，多少都会与道教沾点关系，留下“退之服硫磺”的争议。韩愈之类醇儒尚且如此，那些悠游于三教之中的知识分子与道教等宗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唐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或多或少会受到“房中”观念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发生在“房中”与医术、道教融合的背景之下，此时在男女两性结合的问题上，“房中”、医学、道教已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一）房中术的医学化转向：性知识的体系重构与文本实践

从《唐书》《隋书》对“房中”的著录来看，唐人认为房中术隶属医学领域。这种观念在初唐时代已十分流行。《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于医方类著录“房中”书籍数种，前有《玉房秘诀》十卷，后有“《序房内秘术》一卷”“《玉房秘诀》八卷”“《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诀》

九卷”^[8]，其余如《素女秘道经》等题名指向房中术的著作还有数种。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专门对房中术做出理论阐释，援引传说中的彭祖观点，将房中术引入医学领域，所谓“所以彭祖曰：‘以人疗人，真得其真。’故年至四十，须识房中之术”^{[9](951)}。此观点承自前代，并非孙思邈首创。《隋书》虽为唐人所编，对房中术的看法并非唐人首创，乃承袭唐代以前的通行看法。事实上在唐代以前，“房中”已有与医学融合的趋势，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著作中夹杂有5种房中术相关著作^[10]。若说正式将房中术等同医术，魏晋时期已经彰显。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八《释滞》称：“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11](150)}可见至迟在东晋时期，房中术已被纳入医学领域，被认为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的养生法宝。只不过在葛洪的叙述中，男女两性所处位置不同，女性是采补对象，而男性是获益的一方，凸显男尊女卑的主流观念影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道教体系中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一定处于从属地位，是受到性剥削的一方。葛洪的叙述表明两点：一是“房中”至迟在东晋已与医学、道教融合，二是“房中”作为单一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到了唐代，房中术等同于医术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两《唐书》记录的房中术相关著作均著录于医学门类，《旧唐书》著录房中术于“杂经方”类，与一些专科药方、道教服食方等杂药方放在一起，《新唐书》著录房中术于“医术类”，与《神农本草》《千金方》《神仙服食方》等杂处一类，足见医药、房中、道术的混杂与融合。

文人士子在诗文创作乃至小说写作中，将“房中”观念纳入情节描写并不稀奇。有国外学者总结：“唐代的大部分医书都有专门讲房中术的章节。不过，有些作家在诗文中也以戏谑的口吻插入一些性描写用来逗乐。唐代文学中的这类体裁与房中书中的严肃讨论无关，但却为中国色情文学开了先河。”^{[12](253)}现存唐代小说数量并不算多，单从情节设置和语言表述来看，能完全称得上色情小说的几乎没有，如《游仙窟》中男女双方对话虽充满情欲色彩，但小说主题主要是表现风流才子的狎妓生活，性描写尚算含蓄。唐代诗文创作中色情画面更少，女性题材的诗歌作品稍有江左之风，即有“艳诗”之讥。如元稹《莺莺诗》《春晓》等诗俱被目为艳诗，且其本人也因此被斥为“浮薄”。从现存传奇作品和其他文体作品来看，唐代作者看待男女两性更多是以娱乐为目的，而非着意色情本身，这与道教在唐代的普及有关。而唐代的道教，已将房中术完全吸纳融合。

(二) 道教义理中的性话语：养生、长生与性别权力的再阐释

道教追求愉快的长生，服食和养生则是达到长生的两种手段。“房中”观念认为男女交合乃天地阴阳之道。在这一点上，道教与“房中”达成共识，男女性事成为道教养生途径之一。“房中”就这样进入了道教，并扮演着重要角色。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篇称：“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11](129)}从这个角度来看，房中术与道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到了唐代，道教已经公开将房中术视为养生延年的法宝，而儒家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婚姻、男女两性的观念没有明显变化，依旧持禁欲态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婚姻只是家族联合与延续子嗣的手段，所谓“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3]，将男女结合视为延续姓氏的责任，绝口不提情感和肉体的欢愉。在历朝历代儒家学者对经典传承和阐释的过程中，无人挑战这一观点。与儒家相反，道教反对禁欲，对两性关系持包容态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房中”理念吸纳进来并形成体系。葛洪《神仙传》提到彭祖长生术时，公开指出房中术的意义，曰：“男女相成，尤天地相生也，所以导养神气，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残折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14]而且道教对待女性的态度与儒家区别明显，从追求的目标、养生的途径和神仙体系的构建上来看，道教不像儒家那么轻视女性。在道教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并非两性关系中的从属者和被动的一方，相反，甚至可以成为引导者和阐释者，拥有对性事和相关

疾病的解释权。如唐代医书《外台秘要》卷十七《素女经四季补益方七首》开篇就介绍黄帝问素女关于男性能力欠缺的疗愈之道。可见在道教体系中，女性可以是知识的掌握者、解释者，在两性关系中可以是引导者，而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者。各类房中术书籍中记载的素女、玄女、玉女、采女等女性是“房中”知识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也是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女仙。因此，有国外学者评价“道教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两性关系的发展和提高妇女的地位。”^[12]^(作者序5)唐代道教之繁盛无须赘述，因此“房中”一门虽不及汉代发达，但道教的发展弥补了这个缺憾。道教文献对“房中”观念的吸收和融合，使得唐代“房中”典籍虽不甚多，却仍旧影响着社会生活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生活。文学艺术领域时常彰显着“房中”的影响，如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虽描写性事，但其表达的核心意义则在于将男女间的性事看作“天地阴阳”的结合，是自然的行为，而不是非礼的淫行，可见“房中”与道教融合对士人的影响。

唐诗以风骨、情韵见长，加上早期对江左诗风拨乱反正，诗人多不屑于创作艳诗，流传至今的艳情诗作品少见露骨的情色场面描绘，而唐传奇创作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从《游仙窟》《神女传》等小说的情节及描写来看，其语言表述及表达的一些观点显示作者受到房中术观念的影响。如《神女传》中表露的以阴补阳的观点是典型的房中术观念，《游仙窟》中男主的诗歌自述，情色倾向颇为明显，所述状态与《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所述男女情浓之时的语言风格相近。而这两篇传奇，凸显的是与道教融合的房中术的影响。两篇小说题名中一带“神”字，一带“仙”字，毫不掩饰其对道教观念的反映^①。当然，小说创作中关于两性的描写，并不能与真正的房中术内容相比。与《游仙窟》《神女传》等小说中的情色描写相比，“房中”典籍对男女性事的描述才真正是直面而不回避。文学创作不等于社会思潮本身，但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却是有迹可循的，《游仙窟》《河间传》对性事的大胆描绘，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唐代“房中”观念的影响。

中唐时代，儒学复古潮流成为思想史进程中引人注目的一环。为了匡正社会秩序，拯救唐王朝的统治危机，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站出来号召儒学复古。然而这些人在倡导儒学复古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家，也未大张旗鼓反对道教，这可能与儒家对情感的认知与评价有关^[15]。如柳宗元，深受老庄思想浸染，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7](662)}这无异于宣称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等同。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即便声称反对道教，行为方面却彰显了道教的影响，如“觝排异端，攘斥佛老”的韩愈，留下了“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白居易《思旧》)的讥评。倡导儒学复古的醇儒尚且如此，那些本就能够理解和接纳道教的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道教对性的宽容态度和利用观念，必然会影响到知识阶层对性的认知。“唐代的作家，无论是写严肃的文学题材还是轻松的文学题材，都可以自由地讨论性问题。”^{[12](253)}道教和医学对房中术的吸收融合，使得人们不再视房中术为单纯的性事指导，而是疗疾和养生的手段。

三、密宗东传的性别隐喻与文学镜像——士人阶层对异质文化的接受与表达

在中唐复杂而又混乱的思想史发展进程中，除道教深入人心，影响着士人的生活之外，密宗东传亦是个重要的话题。唐人对性事的看法，是否受到了密宗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思考。唐代传入中土的密宗，对性的态度迥异于正统佛教，传奇小说中的情色描写与其传播有一定关联。密宗，即密教，定义不一，在唐代专指唐开元年间由善无畏、金刚智建立的密教宗派，用以同其他宗派天台宗、贤首宗、禅宗等名称相对应^[16]。中晚唐之际，密宗在士大夫中相当受欢迎。如白居易，从其诗文中可知其接受了部分密宗观念，《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其二)》诗后半部分云：“渐少不满把，渐短不盈尺。

况兹短少中,日夜落复白。既无神仙术,何除老死籍。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掩镜望东寺,降心谢禅客。衰白何足言,剃落犹不惜。”^{[17](566)}此诗虽未明确提到密宗,但“解脱门”“降心”等语与密教“即身成佛”理念相通,可见白居易熟悉密宗观念。《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提到白居易对密宗的接受,文末云:“振辈以居易辱为是院门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还,蒙师授《八关斋戒》见托为记,附于真言。”^{[17](3732)}“真言”是密宗术语,白居易自称是信仰密宗的钵塔院的门徒。可见白居易对密宗观念的接受程度。

对密宗的好奇与接受并非民间发起,而是自上而下的行为,经过中原文化改造的密宗,对中唐诗歌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

传奇小说中的情色作品和艳情描写是否受到密宗的影响,国外学者已有猜想。荷兰人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文自序》中表达了对此问题的看法:“隋唐之时,佛教密宗之仪轨传来中国,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合气成仙之旨融洽为一,马郎妇观音故事即其一例。”^[18]此番论断就传奇作品《延州妇人》(收录于李复言传奇集《续玄怪录》中)而言,可证李复言对于密宗“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合气成仙之旨融洽为一”的接受。

李复言生于775年,比柳宗元小三岁,早年曾与柳宗元订交,且赞成王叔文等人的革新举动,是中唐政治风云的参与者。从文学创作来说,李复言是不折不扣的小说家,且应进士举时曾以小说行卷。《续玄怪录》收录的故事以中唐奇闻异事为主,其中《辛公平上仙》为影射宫廷政变之作,是最为诡谲的一篇,而《延州妇人》一篇可见士人对密宗观念的接受。《延州妇人》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寥寥数语而脉络清晰,讲述了“锁骨菩萨”幻化为美女肆行淫欲的故事。故事前半描述的是美女之淫行,后面忽然转折,指出所谓“狎昵荐枕,一无所却”的淫妇乃是“世俗之欲,无不徇焉”的锁骨菩萨。简而言之,锁骨菩萨幻化为美女满足男性欲望,达到所谓以色止色、以欲止欲的目的。故事通过胡僧之口指出锁骨菩萨的伟大之处乃是无限地满足男性的欲望。整个故事的中心是性,以美女、胡僧、锁骨菩萨编织一个典型密宗故事,传达的观念与传统儒家、正统佛教观念相背离。密宗原属于佛教大乘之一部,后成为独立宗教,其核心观念、体系与佛教大相径庭。佛教反对情欲,密宗提倡“合欢”“双修”,“大乘密教并不主张摒弃世俗,而认为世俗世界的俗念是通向觉悟的有效途径”^[19]。因此,《延州妇人》传达的是以色度人的密宗观念,指出淫与圣乃是锁骨菩萨的一体两面。故事结尾云:“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20]这句话指出民众接受了锁骨菩萨以色止色、以欲止欲的行为,也侧面表明作者李复言对密宗观念的接受。值得一提的是,锁骨菩萨的故事在宋代知识阶层依然广泛流传,黄庭坚《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其二)》诗提到锁骨菩萨,并将其与俗世欢乐联系在一起。诗曰:“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婬娟。”^[21]北宋禅宗也部分地接受了密宗观念,《五灯会元》不止一次提到观音幻化为马郎妇一事。卷十八《浮山真禅师法嗣》条很有意思,录:“峨嵋灵岩徽禅师,僧问:‘文殊是七佛之师,未审谁是文殊之师?’师曰:‘金沙滩头马郎妇。’”^[22]徽禅师不说观音是文殊之师,却说马郎妇是文殊之师,显然已经接受了观音曾化为美女以淫止淫度化人的故事。可见至迟在北宋,密宗以色度人观念已被引入禅宗领域。当然,密宗的主张与儒释道观念相左,在古代中国虽然能产生一定影响,但注定无法撼动三教地位,且在当时也遭到了来自三教的排斥。如陈劭《通幽记》一文,所述故事即是道教人士运用法术抓住害人的密宗妖僧的故事。故事中的“紫衣胡僧”是密宗僧人,其唆使猪妖劫掠少女时所使用的咒语来自密宗体系,而男主角崔简擒住妖僧所使用的正是道家法术。故事传达了两个观点:一是道教乃正统宗教,密宗是旁门左道;二是道教法术远比密宗法术高明。简言之,这个故事显示了道教对于密宗的排斥态度。虽然如此,密宗为了在中原传播,主动吸收了道教的一些观点,在符咒、仪式等方面有向道教靠拢的趋势,一部分观念在中唐知识阶层产生了影响,并以诡谲的图像传播形式和符咒、仪式等影

响了文学创作。如豪侠传奇《红线传》《聂隐娘》中红线、聂隐娘出神入化的本领，显受密宗影响^②。小说创作领域如此，诗歌方面亦如此。韩愈、李贺等人的险怪、诡异诗歌，便有着受密宗影响的鲜明痕迹^③。

四、儒释道碰撞下的伦理突围——艳情书写的思想史坐标与文学史意义

唐代艳情书写的文学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儒释道思想碰撞下的伦理突围。在儒家礼教主导的传统伦理框架中，两性关系被严格限定于“合二姓之好”的宗法责任，情欲表达被视为对礼法秩序的僭越。然而，唐代思想史的多元嬗变——房中术与医学、道教的深度融合，密宗东传带来的异质性文化冲击，以及知识阶层对三教思想的兼容并蓄——共同构成了艳情书写突破礼法禁锢的思想史动力。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文学对情欲的大胆呈现中，更映射出唐代社会对人性本质的重新审视，以及伦理秩序与个体欲望的动态博弈。

（一）思想史坐标：三教博弈与伦理重构

儒家伦理体系以“克己复礼”为核心，将情欲视为需被规训的“人欲”，“男女授受不亲”的训诫成为礼法叙事的基调。然而，唐代道教通过对房中术的养生化阐释，将男女交合升华为“阴阳和合”的宇宙法则，孙思邈《千金要方》直言“识房中之术”乃养生要义，葛洪《抱朴子》更将性事与长生直接关联。这一理论转向消解了儒家对情欲的污名化，为文学中的情欲书写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与此同时，密宗“以欲止欲”的观念通过《延州妇人》等传奇作品进入士人视野，锁骨菩萨“以色度人”的叙事策略以宗教神圣性为纵欲行为赋魅，进一步冲击了儒家禁欲伦理的绝对权威。儒、道、释三教对情欲的不同定义，构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儒家试图以礼法压制欲望，道教以养生合理化欲望，密宗则以宗教叙事升华欲望。艳情书写恰处于这三重话语的交汇点，成为思想史冲突的文学镜像。

（二）文学史意义：人性解放与叙事创新

在伦理突围的背景下，唐传奇艳情书写呈现出两种面向：一是人性本真的回归，二是叙事艺术的突破。以《霍小玉传》《莺莺传》为代表的雅正之作，虽以含蓄笔法写情欲，但通过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揭示出礼法秩序下个体的情感困境。霍小玉“缠绵掩抑”的悲情、崔莺莺“娇羞融洽”的矛盾，皆是对儒家婚姻伦理的无声控诉。而《游仙窟》《河间传》等“越轨”文本，则以直露的欲望书写挑战礼法底线：《游仙窟》以骈俪辞藻铺陈狎妓之欢，将情欲美学化；《河间传》借女性堕落叙事暴露礼法虚伪，柳宗元以冷峻笔法揭示贞洁观念对人性的扭曲。这些作品通过风格迥异的艺术手法，将情欲从道德审判中剥离，赋予其复杂的人性深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艳情书写推动了小说文体的成熟。唐传奇突破史传传统，以虚构叙事探索私人情感领域，其情节结构(如才子佳人模式)、视角转换(如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及语言风格(如诗化意境)的创新，皆与情欲主题的表达需求密切相关。《莺莺传》中“斜月晶莹，幽辉半床”的描写，以诗性语言弱化情欲的感官性，实现雅俗平衡；《非烟传》以“晓钟初动”暗示私通时长，以时间意象承载伦理焦虑。此类叙事策略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维度，更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史余”向“文类自觉”的转型。

唐代艳情书写的思想史价值，在于其揭示了礼法秩序与人性的永恒冲突，以及三教思想在冲突中的调适与融合，是伦理突围的双重遗产。它既是对儒家伦理的局部反叛，又是对道教养生观、密宗教赎论的文学转化。而在文学史上，这种书写以人性解放为内核，通过叙事创新为后世通俗文学(如宋元话本、明清艳情小说)开辟了先路。从《金瓶梅》的欲望狂欢到《红楼梦》的情悟哲学，皆可追溯至唐传奇对情欲的复杂诠释。因此，唐代艳情书写不仅是思想史嬗变的见证者，更是中国文学人性探

索与形式演进的重要里程碑。

五、结语：唐传奇情欲叙事的思想史价值重估

保存至今的完整唐传奇作品约 40 余篇,虽非当时创作全貌,但仍旧反映了丰富且复杂的唐代社会生活。站在思想史视域下进行观照,可知佛道等宗教的发展^①,不仅为传奇创作提供了素材,扩大了表现手法,还影响了作者面对男女两性结合的态度。作为俗文学的唐传奇,有别于代表正统文学的诗歌,无“言志”的责任和使命,不用顾及“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叙写故事时可以在更多层面展露社会生活和人性真实。而知识阶层在房中术与医学和道教融合、密宗东传等因素的影响下,对男女两性结合的观念突破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回归饮食男女的人性本质。在涉及男女婚恋的唐传奇作品中,无须刻意回避艳情场面的表达,或婉转呈现,或直白浅切,展现了礼法秩序与人性本真的对话,为后人呈现了丰富精彩的唐人生活画卷。

注释:

- ① 关于道教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可参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第五章《道教与唐代小说》。葛兆光认为,道教人物、道教故事、道教法术仪式等均被唐代小说作者直接“挪移”进小说,以至于一些宣扬道教的唐传奇作品与宗教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 ② 关于密宗对唐代豪侠小说的影响,可参夏广兴:《密宗与唐五代文学创作——密宗成就剑法及密宗民俗信仰对小说创作之影响散论》,《古籍研究》2004年第1期。夏广兴认为密宗的内容和形式,对唐代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理念亦开拓了文学创作领域,特别是其成就剑法催生了中晚唐大量剑侠小说。
- ③ 详见黄阳兴:《图像、仪轨与文学——略论中唐密教艺术与韩愈的险怪诗风》,《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黄阳兴认为,中唐时代密教信仰及其艺术图像的盛行,赋予韩孟诗派以巨大的幻想和驰骋思维的空间。
- ④ 学界普遍认为,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艺的兴起,加上诗文的成就、佛道教义的传播流行,为唐代文人创作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扩大了艺术表现手法。详见汪辟疆:《唐人小说·出版说明》。

参考文献:

- [1]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486.
- [2] 汪辟疆. 唐人小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 葛兆光. 想象力的世界: 道教与唐代文学[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0: 20.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31.
- [5] 张虎昇. 由《游仙窟》说到唐传奇的衰亡[J]. 江汉论坛, 1989(3): 64-68.
- [6]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979-4980.
- [7]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8] 魏徵, 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1050.
- [9]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 李景荣, 等校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 [10] 盖建民. 道教房中术的性医学思想及现代价值[J]. 宗教学研究, 1996(1): 77-84.
- [11] 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2] 高罗佩. 中国古代房内考[M]. 李零, 郭晓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53.
- [13]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郑玄, 注. 龚抗云, 整理. 王文锦, 审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888.
- [14] 葛洪. 神仙传[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10.
- [15] 华军. 传统儒家情论的理路、特质及其当代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21-30.
- [16] 吕建福. 中国密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4.

- [17]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18] 高罗佩. 秘戏图考[M]. 杨权,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16.
- [19] 诺布旺丹, 巴桑卓玛. 藏传密教的女性观[J]. 佛学研究, 1996(1): 273-277.
- [20] 李复言. 续玄怪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95.
- [21] 黄庭坚. 黄庭坚诗集注[M]. 任渊, 等注. 刘尚容,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36.
- [22] 普济. 五灯会元[M]. 苏渊雷,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221.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literary generation of erotic narr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centered on the legends of Tang Dynasty

HE L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Legendary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nvolve love and marriage, inevitably face the problem of describing erotic scenes, some of which are brushed aside, some of which are subtle and euphemistic, while others are simple and rude. Well-known classic love legends, such as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and *Biography of Yingying*, are characterized by beautiful and tactful writing. Another kind of works, such as *Youxian Cave*, which has a strong erotic meaning, have gorgeous language and are full of teasing, while *Biography of Hejian*,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is famous for being straightforward and explic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fucian ethics, whether it's the romantic and exotic *You Xian Cave*, the vulgar and explicit *Biography of Hejian*, or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which praises love, all of them are "erotic" works, manifesting a tendency to break through the etiquette order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Ta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cess of thought history, such as the knowledge of sexual intercourse and medicine, the integration of Taois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antric Buddhism into China, the concept of combining men and women broke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returned to the human nature of food and sex. In the legendary works about men's and women's love and marriage, there is no need to deliberately avoid the writing of erotic scenes. Instead, different artistic techniques should be employed to express them so as to display a vivid picture of social life in Tang Dynasty to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legends of Tang Dynasty; erotic writing; Taoism; Tantric Buddhism

[编辑: 陈一奔]